
November 2016

From Discourse of Political Practice to Strategy for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Jameson's Aesthetic Transforma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Yuyu Wu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Wu, Yuyu. 2016. "From Discourse of Political Practice to Strategy for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Jameson's Aesthetic Transforma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6, (6): pp.202-210.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6/iss6/8>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从政治实践话语到文化阐释策略

——以詹姆逊对毛泽东思想的美学挪用为例

吴娱玉

摘要：西方左翼运动在现实中遭遇挫折之后，其实践经验转化为一种文本阐释的方法，但很少有研究这样追问：政治实践的失败，如何在话语实践中重新获得新生？本文试图以个案研究——詹姆逊对毛泽东思想的美学挪用——将这一转化的来龙去脉展现清楚，这一转化以三种方式表现出来：一是理论的旅行——通过文本的旅行而发生变异，二是实践的影响——通过语境的抽空而发生变形，三是对毛思想的化用——保留能指、转变所指。在詹姆逊的视域中，毛的思想和实践是一个进行理论反思的着力点，也是一个理想化了的“他者”。

关键词：詹姆逊；毛泽东；政治无意识

作者简介：吴娱玉，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文艺学、现当代文学，电子邮箱：fivefishfish@sina.cn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欧美左翼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5AZW001]、第58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课题“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中的当代中国”[项目编号：2015M581578]的研究成果。

Title: From Discourse of Political Practice to Strategy for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Jameson's Aesthetic Transforma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Abstract: After the Western left-wing movement suffered setbacks in reality, its practice experience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a method of textual interpretation. However, there are very limited studies to question how the failure of such political practice is reborn in a new discourse.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ain its process through the case of Jameson's transforma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into aesthetic. The transformation finds its expression in three aspects: 1) theory travel — variation occurs as the text travels; 2) the impact of the practice — deviance happens when the text is decontextualized; and 3) the transformative borrowing — the signifier is preserved and the signified modified. In Jameson's view, Mao Zedong thought and practice is a point of departure for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in this regard, thus becoming an idealized “other”.

Keywords: Jameson; Mao Zedong; political unconsciousness

Author: Wu Yuyu, Ph. D., is a lecturer at the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Email: fivefishfish@sina.cn

对于西方左翼思想家来说，1968年的“五月风暴”是一个令人绝望而吊诡的时刻：运动的失败既斫伤他们的行动能力又刺激着他们在理论上井喷式的发展。这一现象在1966年出版的《否定的辩证法》中已被预言，阿多诺说到：“一度似乎过时的哲学由于那种借以实现它的要素未被人们所把握而生存下来”⁽³⁾，他所要表达的意思是：

若指向政治实践的哲学得以实现，它就变得不再需要，若骤然中断，未释放的能量反而会使它保存下来。阿多诺的这番言论现已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识，佩里·安德森、伊格尔顿等^①都认为：左翼的政治实践在现实挫败后，改头换面成为一种思想资源在话语实践中获得新生。但似乎很少有研究这样追问：政治实践的失败，如何在话语实践中重新获得新生？其中经历了怎样的改写、

变形和挪用?本文以詹姆逊对毛泽东思想的美学挪用为例,考察其中的变化轨迹。

在詹姆逊的著作中,论述毛泽东思想及其政治实践的文字随处可见,以至于谢少波称他有根深蒂固的“毛情节”(104)。在《历史的句法》中,詹姆逊的“毛情节”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说:“六十年代中,第一世界在诸多方面都受到第三世界的启发,如政治文化术语、如象征性的毛主义”(2:180),其中,毛的文化政治体制,“提供了一种新型政治蓝图[……]它从传统的阶级范畴中解脱出来”(“Periodizing the 60s”182);詹姆逊将毛泽东与六十年代其他反霸权人物看成是“打破受剥削的劳动阶级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陈规旧习”(Syntax of History 2:191)的领军人物,毛无疑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代表,因为毛最具理论气质,“特别是在毛泽东的文章《矛盾论》中,不同类型的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复杂性、由此而生的“多元决定论”被清晰地绘制出来”(2:188),詹姆逊将其奉为一种主义,认为“毛主义”是“在六十年代中最丰富、最具革命性的伟大思想体系”(2:188)。在《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主义》一文中,詹姆逊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为例来阐释“文化大革命”理论,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相互制约的几种生产方式的结构共存”(69)的时刻;在《拉康的想象界与符号界》中将阿尔都塞的革命理论看作是索绪尔语言学、毛泽东辩证法及拉康精神分析学的嫁接。除此之外,詹姆逊在访谈录中对毛泽东的关注也随处可见,与王逢振的访谈中,他认为毛时代是一次中国历史上不太寻常的突破(210);与李泽厚、刘康的访谈中,他认为“毛为整个社会集体构造了一个十分具有号召力的关于未来社会的远景”(“访谈录”1:354)。不止如此,毛的幽灵在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中借尸还魂,始终是不在场的在场,谢少波认为这简直是“毛和弗洛伊德的结合”(105),詹姆逊受毛泽东的影响之大可见一斑。我们似乎可以作这样的解释,“五月风暴”将左翼思想家的革命激情戛然中断,那些已被时代埋葬无法实现的革命实践成为他们的一种缺憾,那些尚未释放出的激情转化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革命情节,这种缺憾和情节促成了他们的反思。在这样的语境之下,与西方左翼思潮异质的毛的理论和实践,日渐引人注目,一方面成为理论家反思的着力点,一方面又被当作一个理想化

了的参照物,这便不难理解毛泽东对詹姆逊的理论的影响。这种影响以三种方式表现出来:一是理论的影响——通过文本的旅行而发生变异,二是实践的影响——通过语境的抽空而发生变形,三是对毛思想的化用——保留能指、转变所指。

一、理论的旅行:《矛盾论》— “多元决定论”—“认知测绘”

赛义德认为“相似的人和批评流派、观念和理论”是“从这个人向那个人、从一种情境向另一种情境、从此时向彼时旅行”(138)。毛思想就是经过这样一次漫长的旅行,漂洋过海进入到詹姆逊的理论体系中的,这次旅行的痕迹以文本的形式记录在案:从毛泽东《矛盾论》到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再到詹姆逊的“认知测绘”。阿尔都塞是毛思想和詹姆逊理论的中介,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矛盾论》就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尤其是对阿尔都塞产生巨大影响,其影响如何?本文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论述。

一、精神相契。佩里·安德森曾说:“阿尔都塞对中国的同情是难以掩饰的”(53),阿尔都塞认为自己所处的语境与毛泽东当时的革命有某种相似性,六十年代,他感到马克思主义面临危机,试图突破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和理论贫困的窘况,为马克思理论提供更多的存在理由和理论根据。他认为《矛盾论》是毛泽东反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产物,而“多元决定论”也是批判斯大林的“经济决定论”的理论武器,因此两者在精神、情感上具有一致性。

二、理论启发。《保卫马克思》中的《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和《关于唯物辩证法(论起源的不平衡)》专门论述《矛盾论》,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矛盾普遍性和不平衡性理论直接影响了阿尔都塞“矛盾多元决定”思想的形成。文中提到:“毛泽东把‘只有一对矛盾的简单过程’撇开不谈,他这样做似乎是为了一些实际的理由,因为简单过程不涉及他所研究的对象,他研究的对象是社会,而社会却包括许许多多的矛盾”(195)。阿尔都塞通过“症候式阅读”,将毛泽东回避“简单矛盾”的现象解释为他认为矛盾具有“复杂性”,阿尔都塞这样解释到:“毛泽东说:‘单纯的过程只有一对矛盾,复杂的过程中则有一对以上

的矛盾’,因为‘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的矛盾’”(194),由此得出“矛盾多元决定”:“这些‘不同矛盾’之所以汇合成为一个促使革命爆发的统一体,其根据在于它们特有的本质和效能,以及它们的现状和特殊的活动方式。它们在构成统一体的同时,重新组成和实现自身的根本统一性,并表现出它们的性质:‘矛盾’是同整个社会机体的结构不可分割的,是同该结构的存在条件和制约领域不可分割的;‘矛盾’在其内部受到不同矛盾的影响,它在同一项运动中既规定着社会形态的各方面和各领域,同时又被他们所规定。我们可以说,这个‘矛盾’本质上是多元决定的”(100—101)。

可以看出,阿尔都塞受毛思想启发重新阐发了马克思的理论,他认为马克思的社会是“有结构的复杂整体”,它具有三个重要的特征,这三个重要特征都与《矛盾论》中的观点一一对应。一、整体性的结构。任何矛盾都不能单一独立而存在,只有在整体中才能被定义,各个矛盾间相互依存关系构成了“有结构的复杂整体”。这一理论对应《矛盾论》中矛盾的整体性:“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1:328),“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1:330)。二、结构性因果性,各个矛盾互为联系的状态即是一种结构,这个结构不再追求同一,而注重差异或相互关系。矛盾彼此差异、互不排斥才是整体统一的表现。这对应《矛盾论》提出的矛盾具有不平衡性:“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1:322)。三、这一“有结构的复杂整体”始终保持一种稳定性,但其中的主导结构具有可变性。^②这对应着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矛盾论》提到“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1:320)。“在矛盾特殊性的问题中,还有两种情形必须特别地提出来加以分析,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1:320)。毋庸多言就可以发现“多元决定论”中有诸多《矛盾论》的影子,阿尔都塞认为:“《矛盾论》中的基本概念如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对抗性矛盾与

非对抗性矛盾、矛盾发展的不平衡规律等,在黑格尔那里都是找不到的”(Politics and History 94),这意味着《矛盾论》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思维模式,在黑格尔那里,一切事物存在和发展受某个单一的矛盾决定,而马克思创建了一种非黑格尔的辩证法,^③即“多元决定”的理论模式,进而在传统政治经济学变革的基础上发现了结构性的因果规律。

詹姆逊认为《矛盾论》是“结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之一”(“后现代”70),这种赞同是在他受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影响之后的追认。詹姆逊受阿尔都塞“有结构的复杂整体”影响,^④提出了他文化阐释的方法论——“认知测绘”(Cognitive Mapping)——连詹姆逊自己都承认这几乎是凯文·林奇(美国城市设计师)和阿尔都塞的混合体(“认知”1:301)。“认知测绘”源于凯文·林奇《城市的意象》,他认为城市是由彼此独立又相关的多种元素混合而成,若这些元素可被识别,人们对实体环境的记忆、识别、展现、说明、评价和预测就会准确且完整,反之就容易失去方向,难以形成对城市的完整想象。詹姆逊将这一理论引申,认为“林希(即林奇)探讨的城市空间的精神地图可以外推到以各种歪曲形式存留于我们头脑中的关于社会和全球总体性的精神地图”(“认知”1:302)。这一看法实际上是保留了林奇理论的原貌并将它提升为后现代主体对超空间的整体认知。尽管这一理论凭借“多元决定论”的基因和《矛盾论》有某种一致性,但两者相似性已经非常微弱。^⑤本文继续沿着《矛盾论》对“多元决定”影响的两个方面来探讨“多元决定”对“认知测绘”的影响。

一、精神契合。前文论述过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以及他所认为的《矛盾论》都有强烈的政治企图,具有文化政治使命,同样地,认知测绘也是一种抵抗的“政治艺术”,詹姆逊认为“倘使我们真要解除这种对空间的混淆感,假使我们确能发展一种具真正政治效用的后现代主义,我们必须合时地在社会和空间的层面发现及投射一种全球性的‘认知绘图’,并以此作为我们的文化政治使命”(“后现代”515)。认知测绘是后现代政治实践的形式,抵抗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人认知能力的侵蚀,使人重新定位个体和集体,重获行动和斗争能力。^⑥

二、理论接受。林奇的“认知测绘”是对城市想象的心理经验的描述,探讨的是制图法的技术问题,詹姆逊接受了“多元决定”理论,认为“认知测绘”是对后现代超空间认知的“精神地图”,其中有两个层面,一是“总体性”。后现代社会是由不同起源、不同意义、不同层次元素汇合成的统一体,那么“总体性”的视域和研究方法,尤其在多元化、碎片化的后现代就至关重要,用詹姆逊的话说就是以扭曲或象征的方法达到任何个别主体接触或意识不到的那个“缺场”的终极(“认知” 1: 297)。二是“差异性”。对“总体性”的强调并不妨碍对差异和个体的重视,认知测绘基于个体经验对整体现实的把握和建构,^①同时又超越了个体经验的“真实”,达到对世界整体的完整认识。在“认知测绘”中,“总体性”“差异性”并行不悖,詹姆逊如是说:“总体性或总体化概念中蕴含着对方法的需要,以及对显然统一的文化文本内部的断裂、缝隙、远距离行动进行‘症候分析’的相当不同的关注,对二者予以重视而又不出现重大分歧是完全可能的”(Political Unconscious 41),从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阿尔都塞的影子。

从《矛盾论》到“多元决定”再到“认知测绘”,“一个观念或是一种理论在此时此地向彼时彼地的运动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一定历史时期和民族文化的理论放在另一时期或环境里是否会变得面目全非?”(赛义德 138)。《矛盾论》中矛盾复杂多元、不平衡性、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的观点,在“多元决定论”中变成了社会结构的“整体性”“差异性”“主导性”,在“认知测绘”中强调的是保留差异性的“整体性”,着力点在于“整体性”。需要指出的是,《矛盾论》不是单纯的理论分析,而是指导中国社会革命、具有强烈实践性的文本,显然从指导实践的理论资源到马克思主义社会结构理论再到一种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化策略,原先的观念和理论已不是物理位移而是化学反应,变得面目全非,却也因改变而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二、历史语境的抽空：从文化大革命到“文化革命”

经过一次理论旅行,詹姆逊吸收和挪用了毛泽东思想,然而,更让詹姆逊着迷的是毛泽东发动

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实践(这不只是詹姆逊的个人情节,许多西方左翼理论家都保有对文化大革命的向往)。当詹姆逊“看”文化大革命时,并非只是一个客观的“看”的过程,而是“看”他想“看”的东西,对他理论构架之外的部分,则几乎视而不见。所以,他抽离了文化大革命历史语境,选取某些理念重新调和转化为文化阐释思想资源,将一种政治实践转变为话语实践。詹姆逊对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资源汲取,可以从两条路径来探究:一是理论推演,二是以他者的视域将其理想化。

一、理论推演。需要指出理论推演和理论旅行不同,理论的旅行是一种顺势而行,由此及彼的一种影响过程,而理论推演是逆向证明的过程,先认可了某种观念,然后在理论上进行推导、找寻其合理性。“文化革命”的理论就属于后者,毛泽东并没有“文化革命”理论,西方理论家是在先接“文化大革命”实践之后再找寻它的理论依据。要厘清理论推演的过程,又需从《矛盾论》谈起,在《矛盾论》中毛泽东提出矛盾不平衡法则:“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1: 322)。这一理论被阿尔都塞解读成革命爆发的原因:各个矛盾具有不平衡性,彼此相互转移和压缩,这使矛盾处于非对抗阶段、对抗阶段或爆炸阶段等时刻变换的不稳定状态。“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说矛盾是动力,那也就是说:矛盾在复杂整体结构中的某些确定的地点引起了真实的斗争和冲突;冲突的地点可能根据当时各矛盾在主导结构中的关系而有所变化;斗争在某个战略地点的凝聚同主导因素在矛盾中的转移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转移和压缩这些有机现象就是‘对立面同一’的存在,直到这些现象产生出突变或质的飞跃的可见形式为止,那时就正式到了改组整体的革命阶段了”(For Marx 215-16)。由此看来,阿尔都塞式的社会革命在《矛盾论》中找到了理论依据。

这一革命理论被詹姆逊进一步作了阐释,他认为阿尔都塞恢复了“生产方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核心地位。在詹姆逊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最生机勃勃的概念,它不是指单一的生产方式,而是各种不同生产方式所形成的共时

性结构;^⑧同时,詹姆逊又从阿尔都塞的因果性学说中得到启发,认为文化可以独立于经济并直接对整个生产方式结构发挥作用,更强调文化的半自律性。詹姆逊将两者结合,巧妙地进行了置换,将文化纳入生产方式之中,并一再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于是阐释的重点从物质意义上的生产方式转移为文化意义上的生产方式。当“共存的不同生产方式已经明显敌对的时刻,它们的矛盾已经成为政治、社会和历史生活的核心时刻”到来,就是詹姆逊所谓的“文化革命”(Political Unconscious 81)。他将“文化革命”视为一种破旧立新、极具生命力的理论,甚至说“文化革命作为新的历史研究的统一范畴,似乎是唯一能使所谓人文科学以物质主义的方式重新组织起来的框架”(“Marxism and Historicism” 69)。如此说来,“文化革命”在实现生产方式的嬗变的同时,构建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念,而后者是詹姆逊极力推崇、重点关注的部分。可以看出,詹姆逊已然将阿尔都塞的社会革命理论转化为“文化革命”理论(这成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历史阐释的理论基础),并认为“文化革命”更具活力和价值,这就在理论上找到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

二是以“他者”的视域将文化大革命理想化。文化大革命是西方世界的“他者”,阿尔都塞、詹姆逊无意回到中国语境去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只把它当作是对照自我,确立主体性的参照物,用以验证其理论的正确性。阿尔都塞反对“经济决定论”,重视意识形态,认为意识形态是可以决定一切的战略点。所以,他十分赞赏从文化领域生发出的对抗和解放的文化大革命理论。阿尔都塞如是说:“如果我们回顾我们过去四十多年的整个历史,我觉得,要算账的话,唯一可以找到的历史上存在着的对‘斯大林偏向’的基础所做的左的批评[……]存在于中国革命的斗争中、路线中、实践的原则和形式中的批评。这是一种沉默的批评,它是通过它的行动,通过从长征到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结果而表达出来的。这是一种从远方进行的批评,一种‘从幕后进行的’批评”(“自我批评” 109)。阿尔都塞以“症候阅读”的方式误读了文化大革命,将一次政治实践看成了一种充满想象力和创造性的话语实践,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反权威的文化斗争,以

独特的方式不动声色地在文化领域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可以看出,阿尔都塞抽空了现实语境,将文化大革命想象成意识形态反霸权、求解放的理想革命。

詹姆逊亦是如此,他同样抽空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语境,将其理想化为一次抵抗和解放,与其说詹姆逊是受到阿尔都塞的影响,不如说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特点。在《历史的句法》中,詹姆逊对文化大革命发表了长篇大论,他认为中国的文革理论是六十年代“最丰富、最具革命性的伟大思想体系”(2: 188),并为文革辩护道:“毛主义和中国文化革命的经验被斯大林化,文革已被重写为东方的又一个古拉格集中营。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都旨在全面诋毁六十年代”(2: 188—89)。詹姆逊将文化大革命这一激进实践看作“文化革命”这一激进理论的完美演绎。当文化大革命被当作“文化革命”时,詹姆逊就把“文化革命”的某些特质赋予了“文化大革命”。

首先是革命拥有解放的力量。詹姆逊认为“在六十年代,人们都有一种同感——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能完成。这是一个普遍解放的时刻,全球性能量释放的时刻,在此过程中,毛泽东的形象最为显著,他喊道:‘我们的民族就像一颗原子弹,一旦原子核发生裂变,必然释放出惊天动地的力量。’这个场景向人们展示了古老的封建农村结构分崩离析后,文化大革命对原有结构所遗留的陈规陋习进行了清理和根除,一个真正的大众民主社会终于诞生。原子的裂变,分子能量的释放,或‘物质能指’的解放,是骇人的奇观[……]在文化大革命千钧一发之际,上海公社诞生,有效地阻止了党的机构的瓦解,扭转了整个集体实验的方向”(2: 207—208)。詹姆逊如此热烈地赞美文化大革命,认为它扫除了封建农村结构中遗留的精神桎梏,实现了大众民主,打破了西方现代神话、反抗了资本主义的霸权,拥有一种摧枯拉朽、力挽狂澜的力量。“文化大革命就被当作残余的意识形态、传统的知识结构、党和政府内愈加严重的非激进化和官僚化与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所有化、人们对自由、民主和现代化的深切渴望以毛泽东对新社会的乌托邦幻想之间的矛盾斗争”(谢少波 104—109)。事实上,詹姆逊只看到文革初期解放群众、实现民主的口号,而对文革中口号和实践之间的罅隙忽略不计,对文化大革命中权力

集中和暴力运动避而不谈,选取了符合他“文化革命”阐释理论的那一部分进行讨论。

其次是具有反霸权的效力。詹姆逊认为六十年代革命风暴的动力不在西方,而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殖民的解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引发并推动了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反体制、反霸权、反战运动,相较而言,中国文化大革命比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意义更显著、影响更深远,它不仅是一场举国上下的政治实践,还具有一套致力于文化和意识形态变革的、系统的文化理论,且在文艺创作中发挥着它的能量,让被压迫阶级拥有反抗的权利和革命的勇气,这一切都为西方左派力量提供了政治文化上的理想模式,詹姆逊认为:“文化革命是对被压迫民族或缺乏革命意识的各劳动阶级的集体再教育;作为一种战略,文化革命旨在打破已成为人类历史上所有受剥削的劳动阶级早已内化于心的俯首贴耳、唯命是从的陈规旧习”(2: 178)。对西方左翼激进理论家来说,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正与他们内心洋溢着反霸权的叛逆心态相吻合,同时又与他们改天换地的理想主义精神产生共鸣。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传闻被六十年代西方左翼知识分子渲染为文化政治上进行抵抗和反叛的灵感和楷模。“当时许多国家都有学生造反,成立红卫兵之类的群众组织,占领校园,串联社会。著名的一九六八年五月巴黎学潮中不少学生领袖都以毛泽东思想的信仰者自诩。一时各种外文版《毛主席语录》十分畅销,连宗教界都不得不对无神论刮目相看,借文革的东风,印行《基督主席语录》,足见文化大革命影响之广”(郭建,“杰姆逊”)。

再次是文化的革新。詹姆逊认为毛泽东“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即文化革命的历史”可作醒世之语写入“后现代文化批评宣言”(郭建“杰姆逊”),可以看出,詹姆逊已巧妙地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实践置换为一种文化阐释的方法,他用“文化革命”取代传统的历史革命说,规避了历史“线性”发展的理论,使之成为一种相互关联、彼此作用、“共时的”阐释方式;同时,他以“文化革命”取代物质生产方式革命,试图以文化阐释理论取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将生产方式延伸到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并将其作为文化阐释理论的主符码。“文化革命”被视作是一个文化再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生产者的活动不

完全依赖于物质基础,而是相对独立具有自主性并担负着重写文化、历史、社会的政治使命的一种再创作。他在《政治无意识》中将“文化革命”的价值再度抬升,认为文化研究必须“政治领先”,意在阐释和挖掘错综复杂社会现象背后的“文化革命”,将文本中被遮蔽却无时不在的政治无意识重新打捞上来,这种阐释方法具有一种“崭新的、终极的视野”。在这样的视野中,“文化革命”中的阶级斗争被理解为文本叙事的文化策略与主流文化体系的对抗,也就是说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在文化上采用种种策略将自己的主张和立场合法化,而与之对立的文化或意识形态通常会以隐蔽的方式或者伪装的策略游离于主导价值体系之外,甚至暗藏着阶级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于是,文本不再止步于表面内容的展现,而致力于意识形态潜文本的重新书写和革新,这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的语境已全然不同。无需多言,詹姆逊事实上是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实践转变为了“文化革命”的阐释方式,这一魔术表演的全景至此已展现无余。

三、对毛思想的化用:乌托邦和政治无意识

经过理论旅行、语境抽空之后的毛思想虽然已面目全非,但这着实是基于理论和事实的、有迹可循、有案可查的一种务实挪用,相对而言,第三种方式是一种想象的务虚的化用。从两个无论是对毛泽东还是詹姆逊都极为重要的关键词——“乌托邦”“政治无意识”来看,可以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

先看乌托邦。毛泽东的乌托邦想象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紧密团结在一起,在资本主义霸权之外建立一片飞地,詹姆逊的乌托邦想象是用文化斗争来取代阶级斗争,在文化阐释的视域内将乌托邦解读为在资本主义之外寻找一片飞地的反霸权的一种文化政治策略。两者在精神上若合一契,谢少波说正是“‘乌托邦焦虑’使得毛和詹姆逊结合起来”(谢少波 116),但实际上两者截然不同。

毛泽东的乌托邦强调同一性,并把这种同一性付诸实践。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军队整齐划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经济建设上大炼钢铁、实行合作化道路,在工业农业上实现同一性;日常生活中实行人民公社,建立集体食堂,定时定量吃大锅饭,

人们服装、生活物资统一发放,完全同一;文化上要打造“文化的军队”(“讲话”28)，“样板”的出炉,写作组的出现,以集体写作的方式代替个人写作等等都是为了用一个符合标准的模板来防止文学上的旁逸斜出。说到底,这样的乌托邦是抹杀个人、差异的集体主义。

而詹姆逊乌托邦思想则强调的是差异性,并始终在文化阐释的领域内完成。他以阿多诺的非同一性为原则建构了乌托邦理论:阿多诺非同一性理论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反思,以否定辩证法反对肯定辩证法,他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以绝对同一性原则,为社会历史发展预设了虚假的目的,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产物。詹姆逊受到阿多诺的影响,认为真正的总体性是以非同一性形式表现出来的,以非同一性思维来思考同一性的总体才是辩证的、开放的和面向未来的真实总体,它不再服膺于对未来蓝图的主观预设和虚假描绘,而是在主客体现实结合中探寻未来的多种可能性,只有在非同一思维中,乌托邦冲动才能产生。后现代主义的碎片化、差异化和多元化破坏了人民集体的社会记忆和历史意识,而乌托邦表达了集体性的同一,因此,任何社会的集体生活都召唤着乌托邦思想的出现。说到底,这是一种肯定个体、差异的基础上的一种集体主义。

毛泽东的乌托邦是对意识形态的肯定。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也是意识形态的创造者和绝对捍卫者,他的意识形态乌托邦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送瘟神”),号召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赶英超美实现共产主义,与之配套的是文化政策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斗争”(“纪要”15)，“文艺服从于政治”(“讲话”1)。官方提供的蓝图与文化宣传的效果相叠加,营造出一个激情澎湃、无限美好的新中国的图景。

而詹姆逊的乌托邦思想强调的是对现实的否定,站在官方意识形态的反面,他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只有恢复乌托邦欲望和冲动才能保持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否定和超越,乌托邦的目的不在于设置一个让人趋之若鹜的美好未来,也不一定具有实际的社会功效,然而,作为未存在之物,乌托邦“也许能够为那些在概念上无法与现

实相区分而其存在却与现实相吻合的那些为数不多的现象提供一种景观”(“乌托邦”3:370)。所以,乌托邦精神的价值在于它为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提供了一种具有活力的可能性和一种别样的风景。与毛泽东乌托邦不同的是,在詹姆逊的乌托邦中,文艺具有独立性,自律性和反抗性,詹姆逊借鉴了阿多诺艺术审美拯救乌托邦的理论观点,将对抗资本主义异化的希望寄托于艺术审美,认为艺术总是和现实生活保持距离,可以抵抗物的异化,具有自律性、独立性,正因为艺术独立于现实生活,因此艺术审美就有可能被赋予超越现实、批判社会的意义,于是艺术审美中包含了抵抗的、否定的力量。

再看政治无意识。毛泽东认为“文艺服从于政治”(“讲话”28),詹姆逊认为“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Political Unconscious 5)。毛泽东所谓的文学是政治实践和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表面上看起来极具相似性,“训练有素的读者将在这部丰碑式的著作中捕捉到毛的回音。政治无意识的概念本身同毛对个人和政治关系所做的调停也有几分相似”(谢少波 105),而实际上两者相去甚远。

毛泽东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论断具有政治权威性。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过“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32)、“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27)等表述,这是他以党内最高权威身份进行的一次宣讲,随着政权获得合法,这一原则日渐成为新中国文艺创作的金科玉律,到文革时期文艺只能发出政治绝对正确的声音。因着其权威性,也就意味着《讲话》会成为一种政治实践,文艺创作不仅要成为政治的晴雨表,也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2)。

詹姆逊所谓的“文学是政治的”指的是一种文本阐释学的视野。他将社会、历史、政治作为一切阅读和阐释的最终视域,文本阐释要摆脱语言的牢笼、超越形式的分析,通过“症候分析”的方法探索在叙事断裂的罅隙中不曾说出的部分,破除文本意识形态的遏制,探寻文本被遮蔽、被忽略的政治无意识。在这个语境中,詹姆逊才说出了他的至理名言:“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Political Unconscious 5)。但由于叙述并不能直

接地再现历史,文本阐释必须向文本之外的各种关系敞开,打破本身的局限性和意识形态的闭锁,使叙事话语实践与社会、历史、政治之间建立一种联系,使后者成为文本的潜在文本。这里詹姆逊实现了对文本强有力的重构,文本“已不再被理解成狭义的个别‘文本’或作品,而在形式上被重构成伟大的集体和阶级话语”(*Political Unconscious* 61),“文化文本实际上被作为整个社会的寓言模式”(*Political Unconscious* 18)。詹姆逊强调的是一个人化的书写并不一定是破碎的、单一的、羸弱的,其背后必然有这个社会、历史和政治无意识的烙印。显然,詹姆逊所谓的“文学是政治的”与“文学服务政治”南辕北辙。可以看出,詹姆逊对毛泽东思想的化用是保留能指,改变所指,即“乌托邦”“文学为政治”的这一符号的表面意义被保留,而其深层的意义已经被置换成新的内容。

经过理论旅行、语境抽离和意思化用,毛泽东的政治实践话语转变为一种文化策略,在詹姆逊后现代文本阐释中获得新的生命。如果顺势看去,中国的文化资源和实践经验远渡重洋在不同的时空中发酵、转化,被肯定、被吸收,进而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阐释有诸多启示和影响,这无疑是一种难得的理论再生产过程。但如果逆向来看,以西方理论家重新酿制的、理想化了的的中国经验去理解或反证当代中国的文化和实践时,一定要多加警惕,因为它已不再是原来那个真实的中国经验。

注释[Notes]

① 佩里·安德森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同群众实践之间政治统一的破裂,造成了两者之间应有的联系纽带不可抗拒地转向另一个轴心。由于一个革命的阶级运动的磁极,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指针就不断摆向当代的资产阶级文化”;伊格尔顿也认识到“政治上的失败,导致了文化上的成功”。

② “多元决定在矛盾上具有如下基本特质:它是矛盾在自身中对自身存在条件的反映,也就是矛盾在复杂整体的主导结构中所处位置在矛盾自身中的反映。这不是单一意义上的‘位置’。它既不只是‘原则’上的位置(即矛盾在等级性因素和决定性因素,如社会、经济等关系中所占有的位置),也不是它在‘事实’中所处的位置(即矛盾在特定阶段是否占主导地位或服从地位),而是事实中的位置与原则中的位置的关系,也就是说,正是这种关系使

得事实中的位置在主导结构中具有‘可变性’,而总体则保持‘不变’。”见 Louis Pierre Althusser.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1969) 209.

③ “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些基本结构,如否定、否定之否定、对立面的同一、‘扬弃’、质转化为量、矛盾等等,到了马克思那里(假定马克思接受了这些结构,事实上他并没有全部接受)就具有一种不同于原来在黑格尔那里的结构”。见 Louis Pierre Althusser.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1969) 93.

④ “阿尔都塞多元决定的另一个术语是‘复合的多元决定结构性总体’,这个概念力求把整个社会作为一个总体来考察。”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87页。

⑤ 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真实和想象的辩证关系理论也对“认知测绘”有很大影响,因与毛泽东思想关系不大,故本文不专门讨论。

⑥ “认知测绘美学必须要发明一种新的政治艺术,这种政治艺术试图在获得一种再现这个空间的至今尚不能现象的新的模式方面取得突破[……]我们或许可以重新把握我们作为个体和集体定位,重新获得行动和斗争的能力。”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快感:文化与政治》,王逢振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7年),第212页。

⑦ “认知测绘使个人主体能在特定的境况中掌握再现,在特定的境况中表达那外在的、广大的、严格来说是无可呈现(无法表达)的都市结构组合的整体性”。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张旭东编(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515页。

⑧ “共时的东西是生产方式的‘概念’:几种生产方式共存的历史时刻在这个意义上不是共时的,但却以辩证的方式向历史敞开着。”见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81.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 Adorno, Theodor W..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Ashton.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4.
- Althusser, Louis Pierre. *For Marx*.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The Penguin Press, 1969.
- . *Politics and History*. London: NLB, 1972.
- 阿尔都塞:《自我批评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译。台北: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
- [---. *Self-Criticism Anthology*. Trans. Du Zhangzhi and Shen Qiyu. Taipei: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1990.]
- 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括、魏章玲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 [Anderson, Perry.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Trans. GaoKuo and Wei Zhangling. Beijing: The People's Press, 1981.]
- 郭建:“杰姆逊与文化大革命”,《万象》1.4(1999)。
- [Guo, Jian. “Jameson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Wan Xiang* 1. (4)1999.]
-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知的测绘”,《詹姆逊文集》第1卷,王逢振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 [Jameson, Fredric. “Cognitive mapping.” *Collections of Jameson. Vol. 1*. Ed. Wang Fengzhe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4.]
- :“拉康的想象界与符号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张旭东编。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 [---. “The Imaginary and the Symbolic in Lacan.”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Late Capitalism*. Ed. Zhang Xudo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 :“访谈录:詹姆逊——李泽厚——刘康”,《詹姆逊文集》第1卷,王逢振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 [---. “Interviews: between Jameson, Li Zehou and Liu Kang.” *Collections of Jameson. Vol. 1*. Ed. Wang Fengzhe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4.]
-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 [---. *Postmodernism and Cultural Theory*. Trans. Tang Xiaobi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 :“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张旭东编。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 [---.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Late Capitalism.” *The Cultural Logic of the Late Capitalism*. Ed. Zhang Xudo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 :“乌托邦与实际存在”,《詹姆逊文集》第3卷,王逢振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 [---. “Utopia and the actual existence.” *Collections of Jameson. Vol. 3*. Ed. Wang Fengzhen.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4.]
- Jameson, Fredric. *The Ideologies of Theory: Essays 1971 – 1986, vol. 2: The Syntax of Histo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 . “Marxism and Historicism.” *New Literary History* 11. (1) 1979: 41 – 73.
- . “Periodizing the 60s.” *The 60s Without Apology*. Eds. Sohnya Sayres et a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 .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 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 [Mao, Tse-tung. “On Contradiction.” *Se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Vol. 1*. Beijing: The People's Press, 1991.]
- :“七律·送瘟神(二首)”,《人民日报》1958年10月3日。
- [---. “Qi Lv: Saying Goodbye to the God of Plague (Two Poems).” *People's Daily* 3 Mar. 1958.]
-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红旗》9(1967): 11 – 20。
- [---. “Summary of the Forum on the Work in Literature and Art in the Armed Forces with Which Comrade Lin Piao Entrusted Comrade Chiang Ching.” *Red Flag*. 9 (1967): 11 – 20.]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
- [---. *Talks at the Yen'an Forum on Art and Literature*. Beijing: The People's Press, 1975.]
- 爱德华·W. 赛义德:“理论旅行”,《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 [Said, Edward. “Traveling Theory.” *Selected Works of Said*. Trans. XieShaobo and Han Ga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9.]
- 谢少波:《抵抗的文化政治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 [Xie, Shaobo. *Cultural Politics of Resistanc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99.]

(责任编辑:王嘉军)